

「消聲」的 中國自由派

本刊記者/廖濯



近年來，曾經高調活躍於公共輿論場、引領思潮的中國自由派，伴隨著整個國家公共輿論管控的收緊，日益趨於平靜和消聲，普遍沉寂，偶爾才會在輿論場激起一些漣漪，如2018年的「Me Too」運動、問題疫苗事件和2019年的香港修例風波。與之相反，左派、民族主義者反倒更加活躍，反思和批判自由主義的聲音明顯增多。而曾經被中國自由派視為燈塔的美國，自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以來，逆全球化大勢，大打貿易戰，毫不掩飾的美國優先和利益導向，更是令一些中國自由派產生困惑。值此之際，有必要重新認識中國自由派及其近年來在公共輿論場上的沉寂。

曾引領思潮的中國自由派

自由派在中國語境下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泛指對國家權力和政府政策懷有疑慮，倡導憲政、競爭性多黨民主制、法治、市場，宣揚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群體。某種程度上講，中國自由派非但不同於西方社會的自由派定義，反而融合了西方左和右、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價值訴求，內部構成比較紛繁複雜和多種多樣。

當代中國的自由派興起於改革開放之初，藉由思想解放、反思文革、引進西方思想文化的社會環境，啟蒙自由主義迅速傳播和成長，短時間內就在公共輿論空間中佔據主導地位，甚至成為一些學者眼裏的

「八十年代的共識」。自由派積極介入中國公共事務，有人翻譯西方思想文化作品，出版介紹人文社會科學最新發展的書籍，如《走向未來》叢書；有人重新發掘以中國學者胡適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義以及顧準、陳寅恪在專制、嚴酷學術環境下堅守學術尊嚴的精神；還有人針砭時弊、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和制定，推動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除去激進或不學無術的少數之外，知識分子總體傾向於自由主義，一些人甚至被公共輿論賦予道德光環。

被視為中國新權威主義代表學者的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蔣功秦曾有文章回憶稱：「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全社

會對文革災難的反思，知識分子率先呼喚人的尊嚴、價值、自由、啟蒙與思想解放，八十年代是一個以民主啟蒙為知識分子共識的時代，當時全國各地紛紛出現的各種沙龍，校園裏舉辦的各種講座，民間社會也出現的種種思想學術討論，幾乎都是同樣的話題：那就是反對極左的路線回潮，思想解放與啟蒙，要求政治上發展民主，積極支持經濟開放與政治改革。人們的價值趨向均出奇的一致，我們可以把改革初期知識分子中的這種思想狀態稱之為同質性、板塊性、反體制的逆向性思潮。它本質上屬於反對文革專制的自由主義思潮。」

究其原因，一是對於反右、文革那

個極左時代的反思和反彈。正如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鼎新在《當前中國最大的潛在危險》一文所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自由主義者「對西方的經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想並沒有多少瞭解」，「他們提倡自由主義主要是因為1976年之前一次次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以及文革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使他們對一度受到高度認可的共產主義信仰產生了懷疑，對強大的國家權力產生了強烈的恐懼」，「他們的『信仰危機』以及對國家權力的排斥在社會上，乃至在黨內有很大的共鳴，因為大量的老幹部在文革中也是受害者」。

誠如斯言，中共建政前三十年所出現的接二連三政治運動、反右、文革，給不計其數的民眾、知識分子乃至幹部都造成了空前傷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秩序幾乎臨近於崩潰的邊緣，中共建政取得的合法性面臨巨大拷問。有鑒於此，文革結束後，不論社會還是中共黨內，都普遍產生反對個人崇拜、倡導黨內民主、完善法制的呼聲。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防止個人專斷、恢復民主集中制為主

要目的。同年8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直指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領導職務終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權等五大制度弊端。而以限制和規範國家權力著稱的自由主義觀點，恰好契合了當時的社會氛圍。

二是自由主義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與改革開放的方向存在重合交叉之處。不可否認，在一些人看來，自由派的部分主張超出了中國現實國情所能接受的範圍，過於理想主義，但若將自由派的訴求限定在合理區間內，比如市場化、多元化、開放、保護公民權利和財產、法治等，則與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政治發展構成重疊共識。這也使得自由派一度與中共形成合作關係，共同推動國家走向開放多元和現代。

三是國際環境的影響。經歷文革的空前政治災難，社會主義思潮一度處於低潮和窘境。與之相對的是，自由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一家獨大，成為很多人眼裏的普世價值。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活躍。圖為作家胡萬春（左一）、張錦江（左二）、李楚城（左三）、宗福先（右二）、劉崇善（右一）等在上海「泉舍沙龍」交流創作經驗和信息。



對文革極左思潮的反彈 與改革開放方向存在某種程度重合 加上國際社會的影響 自由主義迅速在改革開放之初佔據主流

Thatcher) 都非常推崇新自由主義，並將之運用於治國政策，推動其佔據國際話語優勢。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正是在此背景下爆發，衝擊著中國人的政治認知。不少人將自由主義視作「歷史的終結」，認為中國遲早要成為一個自由主義國家。

上述三種因素的合力下，自由主義迅速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公共輿論獲得主流地位。用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房寧的說法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自由主義「被普遍地賦予了真理性和正義感」，中國思想界發生了一次影響巨大的「移情」現象，當以「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完美理想破滅之後，人們需要另一個完美理想填充他們思想和感情世界，當然，這個新的「理想國」就是「西方」。

遭遇重重困境的中國自由派

近年來，昔日引領中國公共輿論的自由派，迅速陷入窘境，在內外夾擊下頹勢盡顯。



自由派色彩濃厚的雜誌《炎黃春秋》因大量刊發有關中國歷史敏感事件的評論和反思被整肅，是當時自由派言論空間收窄一例。

首先，近年來中國自由派遭遇到「六四」事件以來最嚴厲的政治管控壓力。過去幾年，中國政治的一個突出變化是大範圍強化中共「黨的領導」和決策層尤其是最高領導人的集中統一領導。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中共一改前些年在政治經濟社會治理過程中「黨的領導」遮遮掩掩態度，明確提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對其眼裏有可能威脅和衝擊到既有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的自由派，予以嚴厲管控和防範。這一變化投射到公共輿論上的直接結果是，三種分立、多黨競爭制、普世價值、民主選舉等一系列自由派話語，明顯被迫減少；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網絡大V和媒體的公共空間，被大幅度擠壓，甚至被封號、關停。

2018年，香港端傳媒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全面審查時代：中國媒體人正在經歷什麼？》，以20多位受訪者口述的方式還原了中國媒體人所遭遇的言論收緊，得到了大量具有自由派傾向的媒體從業者的共

鳴。這篇力作儘管讀後給人一種悲觀、灰暗之感，卻也是實情。中國青年學者、廣州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陳純曾分析指出，近年來自由主義言論在輿論場上的式微「主要根源在於公權力的全面打壓，而打壓高潮則是2015年：《慈善法》出台、709律師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數被封等」。的確如此，近年來大批自由派大V被噤聲，共識網、《炎黃春秋》被封殺，互聯網媒體時時原創內容遭「一刀切」，自由派在公共輿論的陣地幾乎已經喪失，並由此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自由派在公共輿論場的頹勢。

其次，中國自由主義思潮不再一家獨大。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發展成就帶來的實踐經驗以及自由主義內在局限性的日益暴露，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自由主義，一度有著啟蒙自由主義共識的知識分子，開始分化，新左派、文化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施派等思潮隨之興起，並在知識界、公共輿論上與自由主義形成分庭抗禮之效果，使得自由派主張遭到相當程度的制衡。正如陳純所言「原本屬於『自由主義者』的那個群體，在這個過程中日益萎縮」，知識分子群體內部出現「大分裂」。

過去一些年，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成功，由一個積貧積弱的落後國家迅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增強了一些人的自信，讓他們不用再像早年那樣只推崇源自於西方的自由主義，轉而思考、提煉並且總結中國經驗。而前些年海內外知識界熱議的「中國模式」恰恰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連「歷史終結論」提出者、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亦坦承：「唯一確實可



2015年，維權律師王全璋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與同期發生在中國的其他事件一道被西方媒體冠名為「709」事件。圖為抗議者在香港中聯辦要求釋放王全璋。

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的中國模式。」

與之相對的是，自由主義內在局限性不斷暴露。近年來已由自由派學者轉為儒家的秋風曾於2011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紀》上刊文《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指出，「中國自由主義者缺乏理論的自覺，缺乏設定理論議題的能力」，「中國自由主義背負了太多常識，容易錯誤地幻想：憑藉這些常識，就可以解決自己在中國所遇到的全部問題」，「中國自由主義始終無法深入到理論的世界中，無法在中國經驗中發展出完整的自由主義理論體系」，「而中國自由主義理論上的貧弱，面對迅速變化的現實時設定理論議題能力的匱乏，乃是在學院、學術界，乃至在觀念世界和政治世界中逐漸喪失魅力、甚至被邊緣化的

根本原因」。今天的秋風儘管備受爭議，但他的這種說法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符合不少人的認知。

秋風還提到，自由派的經濟自由主義觀點，對「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存在大量內部人私有化、權貴私有化現象」，「要承擔一定責任，至少是理論上的責任」，「他們急於消解國有部門」，「而最快捷的私有化當然是權貴私有化」，「經濟自由主義從經濟系統整體效率改進的角度，對此予以默許，甚至給予一定的支持，因為這起碼實現了私有化」，「這一過程也擴大了貧富差距，尤其嚴重的是，這一過程總是伴隨著普通工人在沒有得到充分補償的情況下大規模下崗，從而製造了新的城市貧民群體」，導致一些民眾怨言四起，經濟自由主義失去了「在公眾心目中的榮耀」。曾因

批評重慶市委原書記薄熙來主政時期的知識分子投機而為人熟知的自由派人士榮劍，同樣在《中國自由主義「第三波」》一文中提到中國自由主義處在一種尷尬境地，「在許多新左派人士看來，中國當下的主要制度性問題均是因為引進了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而致」，「自由主義被看作權貴們的天然盟友」。

再者，曾經奠定自由主義風靡世界的國際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第三波民主化非但已經成為過往，還暴露出水土不服問題，相繼出現民主倒退問題。曾被西方譽為民主里程碑的「阿拉伯之春」也折戟沉沙，造成恐怖主義四起的「阿拉伯之秋」和國家動蕩。以2019年在庭審中因心臟病驟然死亡的埃及前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為例，他在「阿拉伯之春」背景下成為埃及現



深圳佳士科技工廠工人希望組建工會維權，而工人採用非法聚集並衝擊工廠等行動影響了正常運轉秩序，警方逮捕了相關人士。圖為2018年示威要求釋放佳士被捕的工人。

代史上的首位民選總統，結果他上任後把埃及帶往「政治伊斯蘭」方向，試圖將自己塑造成新的「法老」；經濟治理更是一敗塗地，在他執政末期，埃及政府提供的數據顯示，有接近5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或臨近貧困線，社會抗議此起彼伏，最終僅僅執政369天，就在軍方的最後通牒和超過1,400萬民眾的抗議聲中倒台。這種動盪不僅出現在埃及，還不同程度地發生在敘利亞、利比亞等伊斯蘭國家，衝擊著自由主義公信力。

西方內部已經發生了2008年金融危機、佔領華爾街、黃背心運動、右翼民粹主義捲土重來以及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等問題。毫無從政經驗、備受爭議的特朗普，竟然被美國人選為總統，令許多視美國民主為典範的自由派大跌眼鏡。特朗普上任後一反美國作為自由民主捍衛者的普世主義形象，打出「以美國優先」的口號，毫不掩飾的利益導向，以反自由主義、反建制的重商主義、民族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為信條，完全顛覆了美國的自由主義聖殿的形象。而特朗普大打貿易戰，深度介入國際和市場的玩法，

更是顛覆了自由主義者的經濟自由化論斷。英國脫歐所暴露出的英國民主弊端，既讓英國政治陷入一團糟，又令自由主義形象嚴重受損。這些都讓中國自由派陷入尷尬、迷茫、失語等困境。

自由派「消聲」的兩面性

中國自由派的「消聲」，會帶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中國社會多種思潮的興起和世界範圍內自由主義遭遇的困境，有助於世人重新認識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倡導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從價值層面來說，的確具有普世意義，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和人性。關於這一點，從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el）到福山，都是從人性本身來解釋的，他們認為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本屬性在於人類有一種尋求「承認」的需要和衝動，而自由和民主恰恰最能集中滿足人類這一屬性。正因這樣，如樂劍所言，「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確已經形成了豐厚的土壤」，「自由權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和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已經深入人心，不可阻擋」。

自由主義主張的市場經濟同樣是人

類社會偉大的經濟制度設計，能充分激發人的創造力，極大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但目前中國自由派面臨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把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意識形態化和教條化，忽略了中國歷史傳統、文化根基和現實國情。在市場經濟上，自由派同樣存在爭議，有淪為原教旨市場主義的風險。有鑒於此，中國自由派要解放思想，看到理論的局限性和適用性，不可自視為高人一等或先進文明代表，也不要道德優越感，而是應設法與複雜的現實國情結合。

另一方面，當前中國公共輿論監管部門對於自由派的嚴厲管控，已經被普遍認為超出了合理限度，造成了知識界的普遍焦慮，限縮了社會活力和公共輿論監督空間，不利於全面深化改革、國家長遠發展。要看到，中國自由派固然有其認知盲區和爭議之處，但多數中國自由派還是基於推動社會發展和國家進步的向善初衷來建言，他們也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和取得的成績，甚至本身就是改革開放的獲益者。

他們的主張儘管有失意形態化，但其倡導的一些觀點、價值，是契合中國改革的方向，也在全社會擁有人性基礎。對他們過於嚴厲的管控，顯然不利於凝聚人心，也會激起很多人的擔憂。事實上，當前中國社會之所以那麼多人焦慮走回頭路，甚至在高層反復釋放積極信號和政策的背景下還不放心，一個根本原因是近年來對於公共輿論尤其是自由派的管控過於嚴厲。因此，如何在維護既有政治秩序的同時適度拓展公共輿論空間，既考驗著自由派群體，也考驗著中共。☞

香港反修例撕開了中國自由派最後一塊遮羞布

本刊記者 / 泉野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曾經異常活躍的中國自由派，漸次淡出輿論場，成為沉默的一群人。只有在一些關鍵時刻，比如習核心確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六四週年紀念日等，才偶爾露露面、發發牢騷。要是細究原因，估計八成會聳聳肩，很無奈地補充上一句：不讓你說還說啥，說了也沒用，最後都懶得說了。

不得不說，自由主義在中國，有著豐厚的土壤。自由派所倡導的自由權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以及私產神聖不可侵犯等價值觀，也早已深入人心。一邊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感召力，另一邊卻是在現行體制之下的失語和離場，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一場突如其來的「割席斷交」以香港反修例大遊行引發的一系列事件為例，或許能說明一些問題。

2019年6月9日，香港爆發百萬人遊行示威，抗議特區政府對《逃犯條例》的修訂。遊行發生當晚，內地不少自由派紛紛表達支持，直言「為香港驕傲」，力撐香港民眾走上街頭。12日，香港再次大遊行，人數再創新高。不過因為在凌晨發生暴力衝擊立法會的事件，香港警察情急之下以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子彈應對之，此舉直接刺激了內地自由派，進而含沙射影將罪責悉數歸因於中共。後續半年多時間，隨著事態的不可控和愈發暴力化，比如當街縱火以及毆打內地遊客和記者等，一些自由派雖然有搖擺，但

多數還是認為暴力的發生有著切實的「由頭」，那就是特區政府未能及時回應民眾訴求，北京過去十二年治港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很顯然，香港反修例遊行對內地自由派來說，更多的是提供了一個情緒的出口。過去幾年，自由派言論空間的大幅度限縮，使得此群體與中共的關係前所未有的膠著甚至對立。所以「支持香港」、「為香港驕傲」背後，實則想要表達的是對中共的不滿。至於修訂《逃犯條例》的必要性，以及衝擊立法會的暴力行為究竟會給香港帶來怎樣的撕裂和傷害，自由派似乎一概不想論。

當不滿的情緒壓倒了一切，理性的認知與判斷變得不可能。好比那些



半年多來香港局勢持續發酵，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圖為2019年7月1日，示威者暴力衝擊香港立法會大門。

走上街頭要求撤回《逃犯條例》的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早已壓倒一切，任何技術性解釋和說明都不會起作用。

這期間，內地學界還發生了一個意外「插曲」。香港百萬人遊行的次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田飛龍發表題為《反修例運動拖累香港法治》一文，指責反修例運動儼然成了「二次佔中」，已經超出合理的和平示威與立法公眾參與的軌道，成為反法治的鬧劇，並稱此次事件「充分而全面暴露了香港反對派不可合作、沒有底線、損害國家利益的政治本質，也暴露出美國對香港的超強影響力及「影子管治權」。

此文一出，內地自由派知識分子一片嘩然，討伐聲此起彼伏，田飛龍兩位師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法學院教授高全喜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後續的「割席斷交」之舉，在加速這股怒火的傳導與擴散的同時，也讓一些人對自由派的「專制」和「不寬容」嗤之以鼻。

處於風口浪尖的田飛龍將兩位師長對自己的態度歸因於「自由派率先文革化」，並認為這是「中國當代思想史的重要現象」，「標誌著一個知識世代的消去」。此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任峰也表示，因政治立場而導致「人倫破裂」、「劃清界限」，不禁讓人想起文革。

自由派媒體紛紛淪陷 被打壓誠然是現今面臨分化和變質的外因 但不能忽視的是 自由派群體中自身存在的問題越來越多

一場事先張揚的自我污名化

自由派率先文革化？這個帽子扣得有點大，要知道雖然文革結束了這麼多年，但仍然一直是自由派的一個心結，用「率先文革化」來定性自由派，對這個群體來說「是可忍孰不可忍」。但退一步，不可否認的是內地自由派群體的「問題」的確在過去幾年越來越突出。其中，當然有中共的原因，比如包括《炎黃春秋》、共識網以及南方系等自由派媒體的紛紛淪陷，還有一些公知在言論管控下被迫消聲匿跡。中山大學博士陳純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分裂及輿論的兩極分化》一文中，就將自由主義在輿論場的式微歸咎於公權力的全面打壓，「打壓高潮則是2015年：《慈善法》出台、709律師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數被封等」。

以上，是切實存在的事實，但也僅僅是構成自由派分化、變質的「外因」，最關鍵的還是「內因」在起決定性作用。而且某種程度上，一些「內因」反過來加速了「外因」的廣度與強度。

具體來說，自由派首先面臨的是「意識問題」。鑒於自由派知識分子天然地追求自由，對愛國主義充滿警惕、反感，擁抱市場經濟，社會運行上贊成分權自治，強調程序正義，所以中共的諸多做法，都讓自由派看不慣。因為多數自由派預設了一個大前提，那就是中國必須走上西方式的道路，美國學者福山



在學術界常常出現自由派拒絕與毛左派同會的情況。圖為左派代表之一司馬南2011年在南京建設規劃展覽館舉行講座。

(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仍在他們的腦子裏不停盤旋。即便歷史終結論本身已經自我終結，其提出者福山也對此做了自我檢討，還是阻擋不住自由派趨之若鶩。

歷史學家、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秦暉早在2012年就說過，不要老提什麼西方和平演變中國，中國也有可能和平演變西方。雖然不知道中國和平演變西方的那一天會不會到來，以及什麼時候到來，至少這樣的說法背後，有一個基本事實支撐：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餘年，被西方改變的地方少之又少，改變西方的可能性卻越來越大。顯然，很多自由派並不願意承認。

更早之前的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美國研究所所長的李慎之，曾為有著中國年輕一代政治學者的領軍人物稱謂的劉軍寧的《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作序《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序文中寫道，「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

一百多年的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坦白說，這不是翻版「歷史終結論」又是什麼？

意識問題之外，自由派的兼容性也越來越差。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胡適說過，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目前來看，很多自稱或被稱自由派的人，不僅沒有了自由主義者秉持的所謂「自由」、「包容」，而且腦子裏充滿了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維。在學術界，甚至不斷出現了因為某一毛左派參會，自由派拒絕與之同會的情況。給出的理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時政評論員石勇在《「左翼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一文中就直言，歷史給自由主義提供過非常好的機會，一直到大概2008年以前，中國社會輿論的土壤都有點偏右。一方面，精英們要「防左」，「左」有歷史污點，被污名化，在「勢」上落了下風，而自由主義卻在競爭中佔據了天時地利。可惜，很快就不行了。

圖為

「不行」的原因，除了近乎民粹的極端化二元思維之外，石勇還提到了一點，當年那些「自由主義者」念念有詞的「自由主義」，並不是多麼與時俱進，恰恰是西方早已拋棄的歷史垃圾。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只是對應於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那種低級版本，站在資本一邊，對平等、社會福利政策特別反感。這正是經典的「右翼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被學者甘陽質問，到底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回答是：貴族的。因為一種站在資本一邊，拒斥平等、社會福利政策的「自由主義」，邏輯上雖然沒有否定，但一定兌現不了平民也享有自由的理論承諾。而至少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同時面臨兩個大問題：制約權力、社會不公。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最多能夠對解決第一個問題提供思路，而對於第二個問題無異於火上澆油。因此，在貧富懸殊擴大、國企管理層收購(MBO)的熱潮中，「自由主義」退化為一種為社會不公和權貴資本「搶劫」進行辯護的理論。這樣的「自由主義」不走向自我污名化，那就奇怪了。

面對這樣的窘境，自由派內部也有一些反思的聲音出現。比如學者榮劍就曾在《中國自由主義的「第三波」》一文中，將自由主義的問題歸結為「致命的自負」。具體來說，任何理論的「自負」，均是來源於對自我能力的過高估計或對自我邊界的模糊。就前者而言，是錯地以為依靠某種理論能夠解決一切現實問題；就後者而言，是不瞭解理論有它存在和發揮效用的約束條件，脫離這些約束條件，理論將

一無所用……自我反思和審查是困難的，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又怎能保證理論的有效性？所以，自由主義在中國要想成一種普遍的價值觀，必須摒棄其「致命的自負」，清醒地認識自身的局限，主動適應現實中的約束條件，以中國的問題意識為導向，將西式話語置入中國語境，開展與各種思想的全面對話；惟有如此，才可能在中國的現實土壤上夯實其理論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一場專制與自由的較量

其實，拋開自由派本身的問題，放在更大範圍和更長時間週期來看，人們對專制主義各種「問題」的認知是相對容易的，批判也因此從未間斷過，但對於自由主義過去一百多年在中國的存在，卻往往缺乏必要的再認識與反思。好像只要舉著自由的大旗，就天然地站穩了道德制高點；好像只要站在現行體制的對立面，各種不如意都可以歸咎於政府。

「中國自由主義者必須能夠解決中國當代面臨的各種問題，尤其是一些關鍵的問題，這才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從教育家嚴復系統將西方自由主義輸入中國開始至今，中國便在不同階段面臨著不同的問題。五四時期，人們看到了「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賽先生」(Science, 科學)，卻忽略了積貧積弱之下普羅大眾對於「錢先生」(Money)的基本訴求；毛澤東時代，中國依然一窮二白，內外兩個大局風雨飄搖，自由主義必然歸於沉寂，因為歷史條件不成熟；鄧小平時代，自由主義有起有落，基本上也未能脫開「關鍵性問題」本身。到了今天，自由主義再次陷入

低谷，原因不會是單向度的自由派本身或是中共，而是各種歷史與現實因素共同導向的結果。

那麼問題來了，究竟該如何認識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實踐與問題？中共黨史專家王海光認為要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專門領域深化對自由主義相關主題的研究。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更大的挑戰。學術的專業化，不僅要求學者秉持價值中立的學術立場，而且還要求學者必須有豐富的知識儲備。目前自由主義理論能力的不足，除了是受制於體制的約束因素之外，還受制於學者自身的知識局限。正是在外在的體制和內在的知識的雙重約束下，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無法達到像上世紀三十年代那樣的原創水平，因為那個時代的言說條件和知識條件都具備了。就歷史研究而言，王海光的深刻體會是，每一個重大歷史問題的「破題」，都是對原有的意識形態構建的一個很大突破，現在這樣的工作已經方興未艾。而自由主義現有的研究模式是缺乏必要的知識支持，僅僅是從理論到理論，從邏輯到邏

輯，其中缺少豐富的歷史內涵、中國元素以及對本土經驗的總結。

中國最大的「本土經驗」是什麼？恐怕不是自由派所謂的「自由」、「民主」，而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小米加步槍」，是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早在1939年，毛澤東有關五四運動的講話中，就提到了問題的癥結，放在今天同樣適用。原文是這樣說的，「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講什麼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Marxism）。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國情，脫離了這個大前提，永遠認不清、看不透。

陳純在《中國自由保守主義的沒落》一文中，曾有過一段「慷慨激昂」的假設：多少人幻想過的「歷史重來」，不就是現在嗎？現在中國有一個比清朝更有組織力的政治體制，有一個比1840年更友善的國際環境，現在中國重新遭遇西方會怎麼樣？說不準。但通過「去西方化」，模擬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再以更「健全」、更「有底氣」的心態去應對，而非「揮刀自宮」以求生存，這不是多少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時刻嗎？和這個相比，所謂的以市場經濟走向自由民主，讓中國變成某個西方國家的一個拷貝，又算得了什麼？

歷史不會重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沒辦法模擬。不過至少，自由主義在中國歷經百餘年的跌宕起伏，也是時候結合中國的關鍵性問題來一場徹底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革命」了。否則，最後剩下的，可能只是一堆脫離中國實際的口水和謾罵。這與自由派一直以來看不上眼的毛左派，又有什麼不同呢？

回到香港反修例的話題，可以說一些自由派的最後一塊遮羞布也被自己不由分說地撕開了。就在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之後，還有一些自由派在朋友圈評論「早該升級行動了」、「不要用青春的血祭不愛你的國」。香港現在的「關鍵性問題」是什麼？是通過升級行動來撕裂整個香港社會嗎？是通過少數暴力分子來挾持北京嗎？至少就目前來看，香港昔日的文明形象正在被折損，法治的核心價值正在被破壞，東方明珠也正在淪為大國角力的「新戰場」。

這樣的香港，自由派看到了嗎？



陳純

中山大學博士
青年學者

自由主義在中國： 從樂觀到悲觀的 複雜變奏

本刊記者甄言元峰

自由主義自十九世紀末傳入中國以來，無論時代背景是興盛還是衰敗，都在中國的歷史中留下了痕跡。中國也逐漸形成了一大群信奉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並期待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以自由主義作為思想之指引。時至今日，自由主義在新世紀遇到種種新的挑戰，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該如何回應這種變化？新權威主義能否以代替者身份進入歷史？在大變局中，中國的共識又在哪裏？對此，本刊記者專訪了青年學者陳純。雖然陳純被認為是自由派，但不時對這一群體進行批判和自我反思。

自由主義的中國脈絡

多維：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同時也是六四三十週年。在這兩個歷史事件背後，自由主義啟蒙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說，自由主義自引進之初便影響中國深遠。

陳純：是的。近代以來自由主義開始被引入中國，是嚴復和梁啟超，或者是更早的王韜、鄭觀應。之所以引入這一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所謂的與西方的「接觸」和西方的「入侵」。這些早期知識分子主要以介紹自由主義為主，並且沒有直接提出「自由主義」這個詞，只是將西方現代政治制度和原則介紹到中國。這種思潮對百日維新、清末立憲等現實也產生了一些影響。這一波先行者對自由主義的介紹，並沒有太多思考這種思潮如何在中國落地、發展等問題，也沒有區分自由主義在諸如政治、社會、經濟各個方面的具體內容。當然無須苛求，因為當時也並非嚴格在學理層面的探討，而僅是引進和學習，沒有必要嚴格區分。

民國時期，至少在新文化運動之前，我更願意將這時期為中國引入自由主義思潮的人稱為泛自由主義者，他們基本上都認同西方的政治制度、文明演變趨勢。與此同時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也被引入中國。引進這些思潮的初衷，都是希望中國變得更加強大。只是，他們並沒有完全區分原則的正當性和實際效用問題。

後來馬克思主義（Marxism）登場，以及更多的思潮，包括無政府主義等同時被引入，自由主義逐漸邊緣化，也漸漸無法吸引大眾，探討則主要停留在知識分子內部。當然自



嚴復

(1854.01.08—1921.10.27)

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系統地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穆勒名學》等著作，是中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啟蒙譯著。



梁啟超

(1873.02.23—1929.01.19)

梁啟超，字卓如、宏猷，別號任公、飲冰室主人。曾與老師康有為合作進行戊戌變法，事敗後逃往日本。辛亥革命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後對袁世凱稱帝不滿，與蔡元培密謀發動護國運動倒袁。倡導新文化運動。



王韜

(1828.11.10—1897.05.24)

中國改良派思想家、政論家和新聞記者。創辦《循環日報》，編譯《西學原始考》、《泰西著述考》等，主張變法自強、君民共主論、實業救國、改革軍事。



鄭觀應

(1842.07.24—1922.05)

中國近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和實業家，也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著《盛世危言》。

中國最大的本土經驗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小米加步槍」，是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出生於農民家庭的毛澤東，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奠定了他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Getty Images



2010年9月22日，理想國文化沙龍的第一場論壇在北京舉行。左起梁文道、易中天、陳丹青、賀衛方、秦暉、吳思、舒國治等兩岸三地八位嘉賓出席。

由主義的邊緣化也與國民黨，這個列寧主義政黨的三民主義有關，因為三民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差別還是蠻大的。最後，摻雜著社會民主主義內容的自由主義，逐漸成為除了馬克思主義和三民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

歷史證明，第三條道路並未走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只能選邊站，一部分知識分子認為，相較於國民黨，共產黨顯得更進步一些，而赴台灣的知識分子，做出選擇的原因可能是對共產主義的警惕。

1949年至1978年之間，自由主義在大陸幾乎滅跡。在台灣則是另外一條演變路徑。事實上，當時在大陸，已經不是自由主義能否存在的問題，而是知識分子能否有尊嚴地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存在的問題。

1978年之後，自由主義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重新登上歷史舞台，而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的黃金時期。當時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存在一種共識，即中國要再次向西方學習，重新引進西方文明。

此時引進的思潮也有二十世紀最新

的思想成果，包括法國哲學家薩特（Jean-Paul Sartre）以及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等思想家。有趣的一點是，當時知識分子對這些思想家的理解更多在自由主義的語境之下，並做出偏向自由主義的解釋。如今一些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當談及海德格爾和薩特，理解上也存有非常濃的自由主義味道。

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的繁榮，誕生了一些有影響力的本土思想家，比如李澤厚。之後也有甘陽、劉青峰、金觀濤夫婦等。轉捩點在八九學運。對於六四事件，客觀去說，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不是全部都對學生行動予以同情，支持學生上街。比如李澤厚就曾呼籲學生要冷靜，用溫和的方式去解決問題。也是在此事之後，李澤厚、劉再復等人發展出一套告別革命論，我在《中國自由保守主義的沒落》中有詳細的描述。這一套論述包括了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內容，在九十年代對傾向改良的知識分子具有很強吸引力。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在經歷了二三十年的發展之後，知識分子發現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

多維：我們注意到，在自由主義的脈絡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思想譜系和派別，在中國同樣呈現出各種類別，比如正在風口浪尖的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

陳純：我個人不太習慣用新自由主義這個詞表達。事實上它的主要代表就是英國的前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美國前總統里根（Ronald Reagan）上台之後的一整套政策，我更願意將其稱為右翼自由主義思潮，或者自由保守主義的一部分。一般來說，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所秉承的是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而美國羅斯福新政（The Roosevelt New Deal）秉承強調政府調控的自由主義，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

新權威主義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現的新思潮。我認為它是自由保守主義在某個階段裏的變體。蕭功秦教授認為，中國在這個階段仍然需要政府推進市場化改革，等國力積累到一定階段，政府的某些職能方面需要歸還社會。

多維：你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左翼自由主義，它與新左派有何差別？

陳純：在我看來，新左派是一批接受了西方後現代理論、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分子。在西方，知識分子利用這些理論去批判資本主義，我認為是有積極作用的。

然而放在中國語境之後，仍然用這套理論去批判中國，用於批判當下的資本主義出現與權貴的結合的情況，這一點我是認同的。但中國新左派更多地批判中國市場化改革趨勢，我不太認同。當然不否認在市場化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

還有需要擔心的是，如果新左派的批判主要方向仍然是西方資本主義

國家，是很有可能與中國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相結合，最後變成僅用於證明中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資本主義制度不行的理論。可以看到，中國的新左派很多人都在論證中國國家能力有多強，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去看，會認為新左派起到的作用是增強了體制的信心，將體制拉入自由主義相反的方向。

左翼自由主義則與此有明顯的差別。早期的左翼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秦暉教授，當然他並沒有自我承認這種身份。他很早就提到，在市場化改革中，有官方背景和聯繫的人極易利用此官方關係謀求利益。

這一點與新左派有些許相似，認為市場化過程中會存在不公正的。不過與新左派不同的是，秦暉教授更強調政府權責平等，即如果政府權力足夠大，應該負擔更多的社會福利，可將一些回歸到社會和市場。

基於此大概可以總結，左翼自由主義的原則即強調自由，也強調平等。而非如新（古典）自由主義或者自由保守主義更傾向的自由優先於平等，甚至不認為需要平等，擔心這樣會壓抑自由。

左翼自由主義本質上也是外來的一種思潮，源遠流長，最著名的版本最早由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開創，經由香港和台灣學者傳播到大陸。大陸新一輩的左翼自由主義學者有周濂、周保松、許紀霖、劉擎等，這一批學者都從做英美政治哲學出身，受到羅爾斯非常大的影響。左翼自由主義需要將理論結合於目前中國的實際。

左翼自由主義者如今會關注更多的社會問題，比如前一段時間的女權問題、工人維權話題。據此思考，政府、社會需要提供怎樣的制度、



李澤厚
(1930年6月13日出生)

中國湖南長沙寧鄉人。哲學家、美學家、中國思想史學家。大學畢業後，曾經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其《告別革命》一書受到頗多讚譽以及爭議。漢學家余英時曾評價他：「通過（他的）書籍，他使得一整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從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解放了出來。」



甘陽
(1952年出生)

中國當代學者，被認為是中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翻譯《人論》出名。主編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暨《文化：世界與中國》（三聯書店），是對那個時代影響最大的叢書之一，不僅奠定了當代中國對西學研究的基礎，也為當代中國「反思現代性」浪潮的興起提供了思想基礎。



金觀濤
(1947年出生)

浙江義烏人。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與方勵之、溫元凱、李澤厚並稱「青年四大導師」或「四大啟蒙導師」。夫人劉青峰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兩人是中文學術界合作無間、共圖理想的「傳奇夫妻」。

法律以及組織去保護這些群體的法律權益。因為這種立場，左翼自由主義在出現之後往往被右翼自由主義者打上社會主義的標籤。

自由派眼中的新權威主義

多維：辛亥百年，憲政、公民社會、革命與改革等話題一度成為中國自由派（廣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及整個社會關注的話題。如今中國自由派主要關注什麼？

陳純：如今自由派有很多關注轉型的問題，比如關注中美貿易戰對中國政治轉型的影響，也有關注在秩序崩潰後如何避免最壞結果。

多維：有觀點認為，中國始終是一個披著現代性外衣的帝國。而且中國究竟該走怎樣一條道路，自近代以來就在不斷求索，新權威主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提出後曾引發熱烈討論。一些自由派認為，中國就應該走上西方的道路。但基於自由民主在實踐過程中暴露的諸多問題，再看中國的現實國情，這條道路對中國真的好嗎？

陳純：如果按照這些人的看法，或許中國終究會再次走向帝國化。只是在當下不太可能，畢竟如今中國已進入民族國家的秩序之中，與一戰之前的國際秩序是不同的。如果中國走向帝國化，必然會引發周邊國家的警惕，也會與這個國際秩序的老大美國產生嚴重的衝突。如今的中美貿易戰本質上也是這一種衝突的體現，而非簡單理解為美國嫉妒中國的發展。

或許中國不是走向帝國化，而僅是通過新權威主義，引領中國前進。只是，新權威主義何嘗不是一種理

想化狀態。新權威主義期望的是，政治權威強大到一定程度會維持政局穩定，同時政權給予經濟和社會一定空間的條件下限制民主。這與自由派期待的一樣，也是一種理想化。相較而言，憲政國家的社會穩定一些，而在新權威之下，政府或者中央的權力將越來越強，會擠佔更多的空間。

一些人為這種體制辯護時，往往會說，目前中共已經形成了一套既有且穩定的規則，這套規則與西方不同，比如任期制、集體領導等。從應然角度去討論，我認為自由民主是優於專制的；而從實然角度，則很難去討論哪個更適合中國。畢竟自由民主從來也沒有在中國實踐，民國時期也並未實現憲政。

多維：具體到新權威主義這個話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各個具體派別對此又會有怎樣的的不同理解和看法？

陳純：右翼自由派對新權威主義相

對不那麼排斥，甚至有很多就是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但左翼自由主義更認同自由民主，即使權威主義可以產生更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穩定，自由民主在價值層面上許多是權威主義無法替代的。

多維：從歷史維度去討論，相較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六四前後，甚至到九十年代初人們對於新權威主義的討論，如今的討論呈現出哪些不同之處？

陳純：當今思想界已經很少有關於新權威主義的討論，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思想界的兩極分化加劇，認同專制的已經不僅訴諸新權威主義，而是從中華文明的政治傳統。而德國政治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對自由民主的批判，是從賢能政治等角度進行辯護。

多維：的確，跟隨著世界範圍內對民主反思的潮流，近些年在中國關於對民主的反思也頗為流行。中國雖然從來沒有實踐過西方定義中的

憲政和自由民主，但在其他國家有過實驗，且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

陳純：的確是這樣的。自由民主的一整套制度在很多國家和地區也都出現了危機，包括美國。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後，很多行為實際上已經打破了美國自身的一套既有的政治規範。英國的脫歐以及法國的黃馬甲運動，也是危機的表現，只是相對來說好一些。而廣泛第三世界的國家，我們也看到了很混亂的情況。相較而言在東亞如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還是相對成功的。我認為，東亞的這種文化與自由民主沒有非常互相排斥。失敗地區，如非洲、中東和拉美，建國之初的社會結構就很糟糕，這又與殖民者密切相關。可見，社會層面的一些問題會直接影響到某個政治制度真正的運作。

中國目前的社會結構相較拉美這些地區而言良性和成熟很多，如果就簡單地說中國可以馬上走自由民主之路也是不理性的。

共識與方案

多維：那麼接下來又該如何？你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共和主義」和「共同體」。這是否可以作為解決的方案？

陳純：建構一個共同體，中國需要公民有更高的參與性和組織性，以及對共同體的 commitment。但是目前在中國仍比較困難。這也是我雖然支持自由民主，但也不會想著中國立刻就能實現的原因。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應該存在許多社會組織和群體，即在國家構建的一整套秩序之外，還應該有另外一套社會提供的秩序。

多維：秦暉教授說過一句話，大概意思是不要總強調西方和平演變中國，也要看到中國其實也有可能演變西方。

陳純：某種程度上講，特朗普的上台與中國和平演變西方存在一定的關係。

我希望中國得以轉型，也同時認識到，中國轉型過程的困難。自由和秩序，是我一直思考的同樣重要的問題。總結來說，目前中共或者中國政府提供了一套秩序，只不過，它是以犧牲其他可替代秩序作為代價的。

多維：相較於少數關注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人，如知識分子、學者或者媒體人，可能這部分人持悲觀態度。而中國大多數的民眾事實上似乎並不在乎這些自由、民主等意識形態層面問題，相反他們認為日子越來越好了，有人為自己做主也不差。所以，同溫層的問題，是否會人為放大悲觀和不满？

陳純：的確。也因此，我一直真正關注的是，中國各個階層究竟如何看待中國以及發生在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中國的大多數普通人，甚至精英階層的訴求中，基本上不會包含民主。

而對於中國的自由派，在中國也肯定就一小撮，絕對代表不了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意見和共識。如果提共識的話，或許最接近的要數剛才提到的新權威主義。只是很多人還不清楚，新權威主義的內部也存在不少矛盾。

自由派期望的自由民主、中國統治核心期望的集權和權威，以及中國絕大多數的共識，三者之間是存在張力的。如果更細分的話，中國的工人、農民和中產階級之間也存在區分和不同，只是目前中國的工人和農民處於失語狀態，更難以找到共識。

此前一段時期，中國自由派佔據了中國輿論場的主流，然而他們並未藉此為工農發聲，瞭解工農想要什麼。當然這也與中國自由派往往代表著中產和精英的態度有關，自由派更願意去啟蒙中產和精英階層。

多維：所以你對中國自由派並不是很滿意。

陳純：事實上我對中國自由派的批評已經太多了，以至於多到一些都不認為我屬於自由派。我只是認為，如今去構建任何抽象的未來的原則都是沒有意義的，更重要的在於去瞭解中國各個階層的真實想法。只有這樣，才能瞭解到真實的民意以及真正可以產生的共識究竟是什麼。☹



2013年1月發生《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圖為南方報業集團辦公室內，抗議者高舉「民主中國」抗議政府的新聞審查制度。